

全球智库半月谈

印度经济：长期增长还是长期消亡

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及分散化货币政策操作的评估

中国通过知识分子回国促进技术转移，但也带来挑战

污染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

理查德·泰勒——诺贝尔奖得主

萨拉菲主义崛起对加沙的威胁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丁丽伟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刘立群

李笑然

单敬雯

史明睿

伊林甸甸

杨 茜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印度经济：长期增长还是长期消亡 6

导读：通过将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与中国的战略自治政策联系起来，莫迪为印度创造了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讨论，探讨印度经济就应向何处去。

特朗普会退出 NAFTA，但是国会会阻止他这一行动 8

导读：NAFTA 即将在 10 月 11 日开启第四轮谈判，很可能结果是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无法达成一致。从法律上讲，特朗普要想抛开国会，直接退出 NAFTA 是可行的。但国会也可通过联合呼吁或通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员财政委员会向总统出建议，因此特朗普总统想要退出 NAFTA 将十分艰难。

全球治理

令人难堪的事实：IMF 与全球金融危机 11

导读：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复苏充其量只能形容为贫血式的复苏，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北大西洋经济中大多数成员国的政治日益两级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促进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但难逃辞咎。

经济政策

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及分散化货币政策操作的评估 14

导读：本文从透明度、效率和简明性三个方面对欧元体系分散化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与美联储相比，欧元体系拥有更多的员工，面临更高的运行成本。

聚焦中国

中国通过知识分子回国促进技术转移，但也带来挑战 16

导读：中国获取技术信息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公民归国时能将其在外国公司和学校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带回本国。海归一方面促进了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带来挑战。

习近平的重要治理创新：领导小组的兴起 20

导读：执政五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政治带来了诸多变化，这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篇文章着眼于过去五年来领导小组全面兴起的现象，为读者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各类领导小组的变迁历史，并展望了未来的几种可能。

中共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新时代 24

导读：各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已于近日闭幕。大会报告中都包含哪些亮点？我们能够从中推测出哪些未来的政策走向？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作者给出了他的分析。

污染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 27

导读：污染能够降低室内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力，减少污染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经济理论

理查德·泰勒——诺贝尔奖得主 30

导读：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因其“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由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第一位合作者撰写，文章认为泰勒对三个研究领域有主要贡献：有限理性、对公平的看法、自我控制的缺失。

战略观察

萨拉菲主义崛起对加沙的威胁 35

导读：萨拉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他们信奉没有删减或更改的伊斯兰教原初教义。该派别成立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受到基地组织思想影响，坚持建立正统宗教国家、反以色列和反西方的立场。作者认为，萨拉菲主义已成为威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一大障碍。

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 38

导读：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特朗普借朝核试验的余热未退，于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讲话，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朝美对话的关注。2017年9月22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朝美关系的发展进入沸点状态、特朗普与金正恩存在巨大的沟通风险以及朝美将继续对话等内容。

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使事情更好还是更糟？ 40

导读：9月30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南部的一个缓冲区，并在那里投放了大量装备，准备在伊德利卜省（Idlib）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区”。本作者认为，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决定是基于其对库尔德武装的担忧。但是，土耳其的行动将面临伊德利卜主要武装派别沙姆解放阵线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稳定局势、能否达成与俄罗斯的交易将成为土耳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大考验。

本期智库介绍 43

印度经济：长期增长还是长期消亡

Suman Bery / 文 安靖宜 / 编译

导读：通过将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与中国的战略自治政策联系起来，莫迪为印度创造了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讨论，探讨印度经济就应向何处去。编译如下：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Navratri 和 Durga Puja 这两个节日远比往常令人兴奋。本文来源于上周三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前财政部长 Yashwant Sinha 的讲话，表达了他对目前经济状态和未来预期的担忧。由于错误的政策判断和内部冲击，他担心未来印度经济会面临硬着陆。

鉴于 Sinha 的经验和资历，他的发言引发了大量关于政治的专业评论。这其中也包括了她的儿子 Jayant Sinha，即莫迪政府民航部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有些奇怪的辩论出现在印度的普通日报，而非商业报纸上。这场辩论关乎增长、和关乎民生的改革问题。

此次辩论是全新且重要的。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目标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甘地提出的关于印度绿化的美好设想，因为上个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被政治家和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抛弃与怀疑。在学界，印度经济改革被认为有很大的风险，且鲜有政治支持。

尽管前总理 PV Narasimha Rao 在 1991 年印度改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近期的评论都着眼于探究他保持原状而非继续推进改革的原因。尽管国大党第一届政府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议会主席 Sonia Gandhi 却与反贫穷（并未成功）和肥胖（事实如此）联系起来。

通过建立增长率、与中国的战略自治与增长的联系，前部长莫迪引导了印度持续且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这也出现在印度的政制讨论中。

经济学家通过潜在产出和总需求导致的实际增长来鉴别政策的好坏。尽管在概念意义上很重要，潜在产出却很难度量。两者的区别被视为“产出差距”。

负的产出差距表示，实际增长比预测经济可能的非通胀增长率更低。同样的，正的产出差距表示经济面临过热风险。目前，探索财政和货币刺激的评论家们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着负的产出差距，尽管经常账户赤字在增长。

以上概念框架会在发达国家引导政策。在那些经济体中，劳动力增长和劳动力生产力的趋势而非教育影响着潜在产出，但是人们很少就政策如何影响劳动力生产力的问题达成一致。

还有一些东西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更加不确定。亚洲其他国家的实证表明，商品市场（通过贸易与竞争），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高精技术（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的进步会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增长。

在此框架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Sinha 的评论。他主要针对的是莫迪政府的许多结构性举措，它们都旨在长期经济的潜在增长。而这一点主要是通过解决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性现象来实现的。像 John Maynard Keynes 一样，Sinha 也认为在长期内我们都不存在了，而短期内这些措施引起的问题受到的关注有所不足，尤其是货物和服务税的问题。他也担心持续的私人投资下降会导致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关于政策的时间、顺序、质量、实施、结果调控、补充措施、交流和整体协调问题，这些来自两位同样可信、富有经验的领导人的观点截然不同。7%（近期）或者 5.7%（本季度）的增长率表明印度不会发生 1991 年那样的危机。

给定全球经济上行趋势以及本年度上半年政府资金增加，放缓的经济不太可能会延缓增值税的征收，尽管旧货币已经被禁止使用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废除旧货币和征收增值税的同时实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二者中，前者会引发更大的担心，因为这全部归由印度储蓄银行管控，尽管印度储蓄银行被视为印度最为专业的调控机构。

尽管与货币问题不同，增值税问题并未被保密，但是其前景仍不明朗，且最初的报告也未被披露。不幸的是，对于这两件大事来说，当前政治体制可能不会允许客观、中立的评价出现。

最后，想要改变印度存在大量非正规劳动力的现状，我们仍面临很多痛苦和压力。在印度国家研究院（NITI-Aayog）以及经济咨询委员会（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的领导下，政府应该协商制定出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

特朗普会退出 NAFTA，但是国会会阻止他这一行动

Gary Clyde Hufbauer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NAFTA 即将在 10 月 11 日开启第四轮谈判，很可能的结果是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无法达成一致。从法律上讲，特朗普要想抛开国会，直接退出 NAFTA 是可行的。但国会也可通过联合呼吁或通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员财政委员会向总统出建议，因此特朗普总统想要退出 NAFTA 将十分艰难。编译如下：

特朗普退出 NAFTA 的想法离实现脚步越来越近了。10 月 11 日开始的 NAFTA 第四轮谈判很可能的结果是，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提出的要求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无法接受，从而上报国会无法达成一致，特朗普反复强调 NAFTA 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

那么，特朗普是否能够在未获得国会和法院同意的情况下退出 NAFTA，从而改写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那些和加拿大或是墨西哥存在进出口贸易的美国人反对的呼声足够强烈，国会也不乏有限制特朗普这一决定的手段。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轮 NAFTA 谈判，很可能聚焦于 Robert Lighthizer 办公室已经提出的一些要求。其中包括：提高美国在汽车原产地标准中的比例，增加协定 5 年自动失效的“落日条款”，消除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的仲裁机制。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断然拒绝这些提议，特朗普是否有权利退出协议将成为核心问题。

法院不可能驳回退出 NAFTA 的申请

NAFTA2205 条协议规定，“在提出书面通知后的六个月内，任何一方可以退出该协定。如果一方退出，该协定对剩余成员继续有效。”法律上的问题在于，总统是否能够自行启动第 2205 条协议，或是需要征得国会的同意？当然，提交退出申请与可以保证进行退出程序是不同的，因为退出的申请在 6 个月之内都可以撤销（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保证退出 NAFTA 的影响不大，那么也有可能更晚的时间废止协议，如 2019 年 1 月 1 日）。鉴于特朗普很喜欢戏剧性的姿态，他可以将申请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如果特朗普真的提交了申请，那么上述法律上的问题将成为焦点。

由于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终止条约的权力，因此历史上这一权力是直接赋予总统的。总统的这个权力只被挑战过一次，即 1978 年参议员 Barry Goldwater 质疑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终止和台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当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William Rehnquist 裁定，这一问题属于不受司

法管辖的政治性问题。还有法院裁定，《共同防御条约》是外交条约，总统有权决定是否生效。只有法官 Powell 表示支持 Goldwater 参议员。

关于总统和国会的权力，1979 年卡特总统案件与现在的核心区别在于：NAFTA 是一项贸易协定，而不是防御条约。宪法第 8 条规定，国会在对外贸易领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管理合众国与外国的、各州之间的以及与印地安部落的贸易”。

也就是说，NAFTA 除了贸易目标以外，还涉及深刻的外交关系。很多评论员都认为，贸易协定远不止贸易问题这么简单，而是打造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框架。如果第 103 届国会在立法时就很有远见的加入相关规定，那么认为终止 NAFTA 需获得国会同意的说法就很有说服力。然而在 1993 年 NAFTA 批准实施时，没有人会想到它在 2017 年危在旦夕。

此外，终止 NAFTA 本身不会改变 3450 号法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的实施。NAFTA 是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但对于美国国内的法院不产生影响。国会没有通过 NAFTA，而是批准了第 3450 号法案，这就是国内事务。如果特朗普总统启动第 2205 条款退出 NAFTA，那么他也不会改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中的任何一个字，因为启动 2205 条款对第 3450 号法案没有任何影响，而且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国会需要同意的文字，那么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可能与卡特案一致，即同意特朗普退出 NAFTA 的申请。

如果退出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将带来那些影响？

如果真的退出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将带来那些影响呢？按照 3450 号法案，特朗普总统将采取那些行动取代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

3450 号法案第 109 条规定，“如果一个国家退出 NAFTA，那么从第 101 条到第 106 条对该国家不再适用”。一旦美国退出 NAFTA，这一规定彻底切断美国与其他 NAFTA 伙伴的贸易关系。如果退出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 NAFTA 协定，由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免税政策自动随之失效，关税将恢复到最惠国水平。然而，如果关税没有自动恢复，特朗普可以通过使用另一 3450 法案来恢复最惠国关税。即使特朗普没有向其他 NAFTA 成员国发出退出通知，他也可以启动 201(b)(1)条款。

201(b)(1)条款是允许特朗普总统否定 NAFTA 好处的关键条款：

- ◆ (b) 其他关税修改。
 - 一般情况。根据第 (2) 条和第 103 (a) 条，总统可以声明：
 - 关税的修改或延续
 - 条款附件 302.2 中规定的修改美国与墨西哥或加拿大的关税

- 继续免税或开始收税
- 额外的关税，由总统决定是否有必要与加拿大或墨西哥保持适当的互惠水平，或作出相互有利的让步。

特朗普在进行总统竞选时，曾宣称美国与其他 NAFTA 成员国的待遇有差别。鉴于此，如果此轮谈判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特朗普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呼吁“互惠互利的让步”提高美国关税。特朗普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同意就可以启动 201(b)(1)条款。

不过，根据 103 (a) 条款，特朗普需要征求贸易咨询委员会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的意见，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员财政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等待 60 天 ITC 的反馈，新的关税政策才能实施。

1974 年的贸易协定法案也将起到作用。根据第 125 条规定，退出自由贸易协定一年内不能改变美国最惠国待遇关税水平，除非总统可以当即发布新的关税公告，否则总统“应该”制定新的合理的关税水平。换句话说，如果退出 NAFTA 的行动迅速展开，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新的贸易关系问题上，国会能够参与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特朗普的决定。

除了关税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法案》还涉及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条件、服务贸易以及仲裁程序等。如果没有国会同意，这些条款将不会受到影响。此外，1989 年的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CUSFTA) 仍然有效，虽然大部分因 NAFTA 而暂停。想必为了保持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CUSFTA 将重新发挥作用。

如果国会想要改变总统对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贸易关系完全控制的局面，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参考卡特案件，国会可以联合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启动 NAFTA 第 2205 条款和参议员 3450 法案第 201(b)(1)条款前，征得国会的同意。同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员财政委员会可以向总统提出建议，因此总统推行这一行动将十分艰难。除非他在行动之前能够获得两个委员会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本文原题为“Can Trump terminate NAFTA?”。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乔治城大学国际金融外交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国务卿助理，美国财政部国际税务部门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令人难堪的事实：IMF 与全球金融危机

James A. Haley / 文 郭子睿 / 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复苏充其量只能形容为贫血式的复苏，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北大西洋经济中大多数成员国的政治日益两级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促进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但难逃辞咎。编译如下：

本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可能会比较低调。毕竟，最近其成员国经济都在积极的复苏，即便是欧洲经济复苏劲头也非常强劲。因此，与会代表如果沾沾自喜，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华盛顿的积极光彩之下，隐藏着令人难堪的事实：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复苏充其量只能形容为贫血式的复苏，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这可以解释北大西洋经济中大多数成员国——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政治日益两级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任务是促进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但难逃辞咎。

IMF 官员喜欢强调，IMF 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机构，不参与全球政治。但事实上，IMF 自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使命。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仅是关于汇率安排，它还要维护充分就业。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分裂确实可以反映几个因素。这不能完全责怪 IMF。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确实促进了这些因素的发展。未来潜在的危险是，政治两极分化将导致政策的两极分化，以及全球经济的分裂。

这种影响在为了促进贸易平衡而进行贸易协议谈判方面体现的很明显。衡量贸易协定有效性的真正标准是提高成员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而非双边贸易平衡。当然，担忧降低关税会导致被保护的部门萎缩是合理的。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受益于市场的扩大，一个行业离开的工人可能被其它行业所容纳。

不幸的是，在危机之后，这一巧妙的效果要么是沉默，要么是完全消失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经济体中，约四分之三的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在整整十年后仍保持在 2007 年的水平。因此，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政客们正将那些失业的人的焦虑和愤怒发泄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期望越来越低的恶性漩涡中。结果是，政策建议承诺将经济从国际贸易的有害影响中隔离出来。这种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困难时期的吸引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一起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著名的主张是经济自给自足。他强调追求经济民族主义，但在追求经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三个“突出的危险”——愚蠢、匆忙、不容忍和令人窒息的批评——这是当今经济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可能会注意到的警告。凯恩斯最终放弃了他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因为它的全部成本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意识到，问题在于，与其说经济政策是纯粹的技术统治，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导致了一种零和博弈的观点，即一个人只能以另一种代价获得利益。此外，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悲惨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观点会蔓延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将经济由零和游戏变成参与者的共赢，如果大家都坚守规则。这一点确实成功了，但现在面临着两点风险。

第一，什么出错了？

1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奖项。经济增长不佳是导致金融危机的“过度”痛苦，或者是政府采取不适当的或没有帮助的政策造成的问题，是真的吗？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将受到赞扬。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还对财政政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仔细评估。危机后的财政政策失误造成了全球总需求不足，这导致了危机后10年的经济增长乏力和产出缺口不断扩大。

第二，如果总需求不足是问题，为什么IMF更有效的去纠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其成员国的政策，以确保它们符合持续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这种监视功能的目的是避免不恰当的政策造成国内不稳定的情况，这可能会对其他成员国造成溢出风险。多年来，监管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辩称，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像他们这样的成员，他们可以利用IMF资源，另一种是针对大型发达经济体。

在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强，使其能够与那些政策造成潜在系统性风险的成员接触，即使这些政策是用来促进稳定的。但是，他没有要求成员改变这个政策，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

与此同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组成的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们也应准备好反思各成员国应担负的义务。IMF的任务是确保充分就业，但具体政策的实施还是要靠各个成员。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会议的代表们将会注意

到，那些未能达到他们所创造的目标的机构最终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本文原题为“Discomfiting Facts: The IMF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及分散化货币政策操作的评估

Francesco Papadia 和 Alexander Roth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 本文从透明度、效率和简明性三个方面对欧元区分散化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了评估, 结果发现, 与美联储相比, 欧元区拥有更多的员工, 面临更高的运行成本。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几年中, 尽管欧元区大大提高了操作透明度, 但它仍然落后于美联储, 尤其是在人员数量和运行成本方面。欧元区拥有更多的员工, 面临更高的运行成本; 欧元区信息公开的方式并不用户友好, 经常是分布在不同的出版物中; 此外, 由于条约要求欧元区以分散化的方式实施货币政策, 因而其货币政策操作相当复杂。

从透明度、效率和简明性三个方面对欧元区分散化的货币政策操作进行评估。值得说明的是, 评估不关注欧元区的效能问题, 即其实现目标的能力; 同时, 评估主要关注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功能, 不关注其监管职能。评估结果如下:

1、操作透明度

- 货币政策透明度是独立中央银行的核心议题
-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变得更加透明, 但相比而言, 欧元体系的透明度仍不如美联储
- 欧元区的信息通常以用户不友好的方式发布
- 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操作透明度不同, 原因尚不明确

2、效率

- 欧元体系的总运行成本接近 100 亿欧元, 其中接近 10 亿欧元用于欧洲央行 (2016 年)
- 欧元体系和欧洲央行的总人数分别为 48000 和 3100 人, 美联储的雇员大约是该数字的一半
- 粗略估计, 欧元区发挥货币政策功能的成本也高于美联储

3、简明性

- 欧元区以分散化的方式实施其主要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管理和量化宽松, 这种操作在本质上是复杂的
- 对于资产购买, 欧元区并不披露不同计划和不同实施方式背后的标准

进一步的建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在操作透明度方面,

- 披露更多有关货币政策操作的信息, 敏感信息可以适当延迟。例如, 提供更多关于 ANFA 操作、外汇储备与欧洲央行自有资金投资的信息
- 采用更多的手段去发布信息, 尤其是关于紧急流动资金援助和可能的资产

购买信息

- 披露更多有关运行成本和员工人数的信息。欧元体系可以建立类似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收集系统，各国央行以标准化的形式向欧洲央行汇报货币政策操作成本的数据，欧元体系最终以标准化的形式发布年度成本报告

在效率方面，

-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欧洲央行的人员过多，但一些国家的央行雇员人数相对于其管辖范围来讲确实存在冗余
- 欧元体系在降低总雇员人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相比于其创立之初，人数已降低了约 17%。尽管如此，欧元体系仍比美联储庞大，应继续降低成本和雇员人数

在简明性方面，

- 披露关于如何制定货币政策的信息
- 简化资产购买操作，例如：建立客观和实用的标准；进一步专业化资产购买操作；让欧洲央行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原题为“The single monetary policy and its decentralised implementation: an assessment”。本文作者 Francesco Papadia 为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希腊金融稳定基金（HFSF）遴选小组主席，Alexander Roth 为 Bruegel 的研究助理。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通过知识分子回国促进技术转移，但也带来挑战

Mary E. Lovely/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中国获取技术信息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公民归国时能将其在外国公司和学校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带回本国。海归一方面促进了技术转移，另一方面也带来挑战。编译如下：

特朗普当局高度重视中国企图窃取知识产权（迫使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分享机密）的行为，并于8月份援引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来开展调查，表示愿意对中国的不正当行为施加处罚。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忽视了中国用来获取技术信息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即中国公民归国时能够将其在外国公司和学校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带回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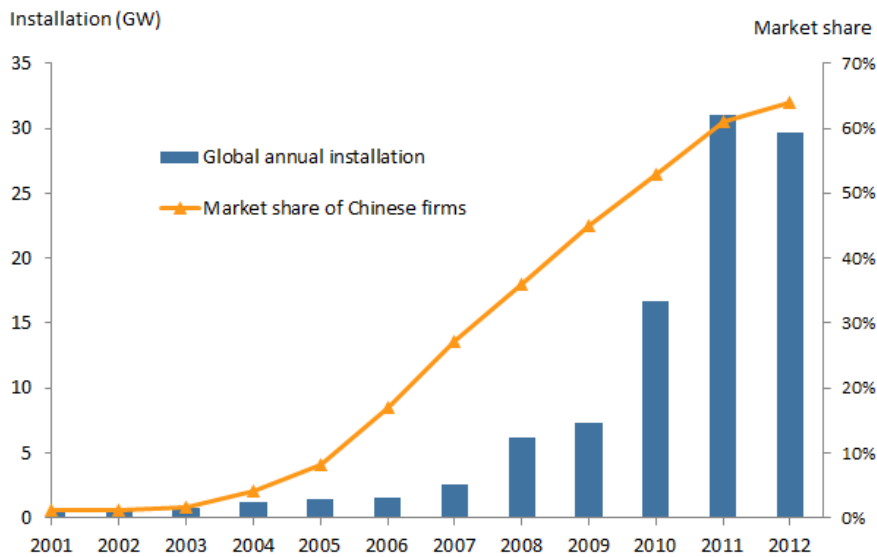
招聘高技术海归是中国在三个国家计划（包括科技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强调的战略目标之一。政府通过提供专门的创业孵化器、减免税款和在所需城市获得永久居留权等来鼓励回国的知识分子创办自己的企业。新华社报道，目前专门为知识分子海归建立的350个工业科技园区中有27000多家企业。由于管理技术转让的法律非常模糊或根本不存在，这些政策一直在合法的灰色地带运作。

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一个很重要问题是，上述措施是否有效地将技术转移给了中国企业。最近的研究发现，技术转移遣返政策有效促进了太阳能（或光伏）行业的创新和升级，并可能间接增加了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

随着政府通过各项政策鼓励在国外学习或培训的中国公民回国，中国的光伏产业与之同步发展。回国的知识分子在将生产出口商品所需的技术带回中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行业先驱者是中国光伏行业著名的“海归三杰”——杨怀进、施正荣、赵建华。这三名来自江苏省的男子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光伏技术，然后带着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回到了中国，开始兴办企业。随后，知识分子海归的增加进一步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投资者和管理者等。

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轨迹表明，吸引和留住世界一流人才可以提升产业能力。如图1所示，即使全球太阳能设备的安装量迅速上升，中国在全球光伏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01年的1%上升到2012年的65%。目前，中国在电池生产和模块装配这些技术壁垒和工业集中度均较低的部门世界领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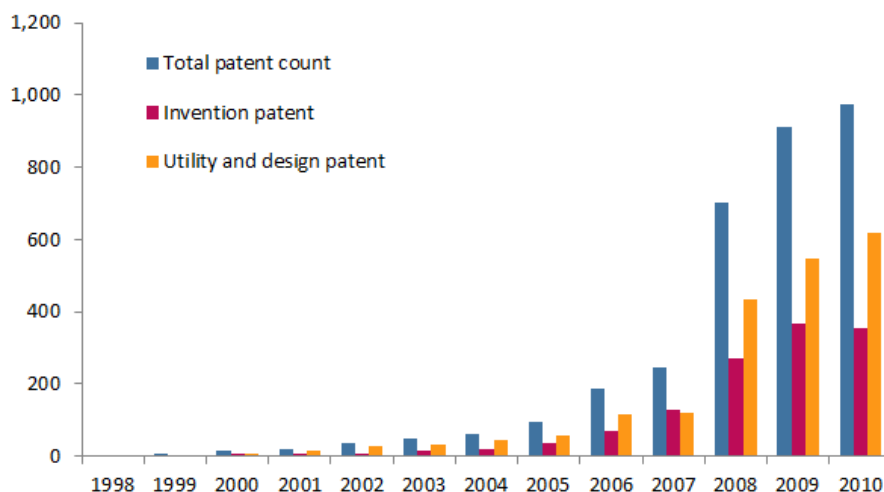
图 1：全球太阳能光伏装置和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2001-2012



Source: Luo, Lovely, and Popp (2017); data from European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sociation.

成功进入光伏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进口了不少下游的电池和模块组装所需的技术。在中国企业愈发活跃的上游，特别是在硅纯化、晶锭和晶圆的生产中，现场技术知识和经验是成功开发产品的关键。如图 2 所示，中国光伏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表明，其科学技术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更加相关的是专利发明的数量，这给予了重大技术方案长达 20 年的专利保护。

图 2：中国光伏企业的专利数量（按类型）1998-2010



Source: Luo, Lovely, and Popp (2017); authors' calculations.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罗四平（Siping Luo）和大卫·波普（David Popp）为在外国培训人才的回国推动光伏产业的技术升级提供了证据。具体来说，我们估计了中国光伏企业的原创创新活动（以专利申请量为依据）与该企业是否有在经济发达国家学习或培训过的企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使用了光伏企业的详细数据、高层管理团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的专利相关活动。

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分子海归既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又为周边企业提供了溢出效应。因此，他们是技术转让和升级的良好渠道。从数量上来看，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效用很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如果有国际经验，其专利申请比其他企业多 6 倍。同样，拥有具备国际经验的首席运营或技术官等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则将专利申请数提高了二分之一。此外，有知识分子海归担任领导者的公司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在同样多的研发投入下，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专利。

另外，由于光伏行业的公司位于许多不同地区，其中只有一些地区以太阳能产业为发展目标，我们能够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促进了专利的发明。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地方市场化改革阻碍了专利申请。虽然市场化政策通过何种渠道阻碍光伏行业的专利申请尚未可知，但这一发现与积极政策在中国光伏产业成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一致。

海归回国带来的“人才流动效应”肯定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在高科技和新兴行业的竞争力。然而，硅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发展中国家对通过知识分子海归寻求技术转让仍然较为谨慎。首先，当新兴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迅速崛起时，产生贸易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在太阳能行业的市场份额迅速上升后，欧盟和美国就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实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明年初，特朗普总统将决定是否对几乎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进口实施“保障”关税或配额政策。

光伏产业发展历程的第二个警示是，国内纳税人可能永远不会从用于吸引高技术人才回国的公共支出中获利。无锡尚德电力公司的主要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一，于 2013 年 3 月宣布破产，其创始人施正荣是澳大利亚籍的海外科学家，在决定返回中国之前拥有多项专利。在破产后，无锡市不太可能收回他最初对公司 600 万美元的投资。

最后一个警示是关于通过知识分子海归进行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间谍活动

之间的细微差别。中国在硅太阳能行业的创新活动是实打实的，中国和国际专利局给本土发明授予的专利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带着他们在技术发达经济体中获得人力资本返回祖国，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架构薄弱的情况下解决知识产权冲突问题将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本文原题为“Technology transfer via intellectual returnees in China’s solar industry”。本文作者是 Mary E. Lovely，她是 2017-2018 年 PIIE 的访问研究员，也是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习近平的重要治理创新：领导小组的兴起

Christopher K. Johnson, Scott Kennedy 和 Mingda Qiu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执政五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政治带来了诸多变化，这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篇文章着眼于过去五年来领导小组全面兴起的现象，为读者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各类领导小组的变迁历史，并展望了未来的几种可能。全文如下：

随着十九大的闭幕，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个任期宣告结束。五年以来，他对中国政治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变革？让我们回顾一下习总书记上台之前的时代。当时，传统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民主集中化。党内存在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保证了最高领导层的责任分工、任期限制、以及交接规则。另外，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既得利益阶层盘根错节，使得诸多改革措施都难以推行。

然而，五年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总书记推行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政治变革，是大多数观察家所没有预料到的。在众多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各种领导小组（LSGs）的强势崛起。领导小组是针对特定的政策（如外交与国家安全、金融工作等）所成立的协调性机构，其成员包括政策涉及的相关部门（通常也同时是互相制约的政府部门）领导。领导小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年代。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领导小组的职能都遭到了弱化，甚至被撤销。但近五年来，领导小组重新在中国的政治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曾于 2015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领导小组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共计入了 39 个各类领导小组，其中有 18 个属于党中央的议事机构，而另外 21 个则隶属于国务院。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处研究的领导小组并不仅仅局限于名义上的“领导小组”。事实上，任何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领导的，具有议事协调职能的机构，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列，这就包括了各种协调小组、工作组和委员会。最近，我们又花了大力气，利用我们能得到的一切消息渠道，重新计算了中国正在运作的领导小组的总数。我们发现，2015 年文章中数出的“39”个领导小组实在是大大低估了中国实际运行的小组总量。事实上，有一些领导小组的工作非常隐秘，外界几乎不会看到任何有关的公开新闻。另外，在过去三年间，又有许多其他各类新的领导小组成立。

经过了对数据的补充，我们大大丰富了对中国各类领导小组的理解。根据我们最新的计算，中国目前共有 83 个各类领导小组正在运作。如图 1 所示，目

前中国共有 26 个领导小组隶属于党中央，57 个隶属于国务院。在所有领导小组中，共有 54 个成立于习近平上台之前，而 29 个则成立于习近平上台后。新成立的领导小组占到所有领导小组的 35%。

	Before 18th Party Congress	Since 18th Party Congress	Total
Communist Party	18	8	26
Government	36	21	57
Total	54	29	83

表 1 中国的各类领导小组

中国的领导小组涉及到从经济到外交、安全、边疆地区稳定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事务。也就是说，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小组在讨论的议题上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尽管党中央也有讨论经济工作的领导小组，但党的领导小组更多涉及宣传、法治建设、外交、安全和边疆地区稳定等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务院下的领导小组有 30 个涉及各类社会问题，而有 19 个则讨论与经济相关的事务。领导小组往往讨论具体的、需要跨部门协同的议题。典型的例子包括国企改革、2022 冬奥会筹办、精准扶贫、以及最令人意外的——足球体制改革。

在各类领导小组中，习近平本人亲自领导了八个。至于其他各类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通常是各分管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委员。这些领导的分配依据主要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应的责任范围。比如说，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自然分管宣传工作小组。而另一位常委张高丽，则分管了超过 10 个与经济工作相关的领导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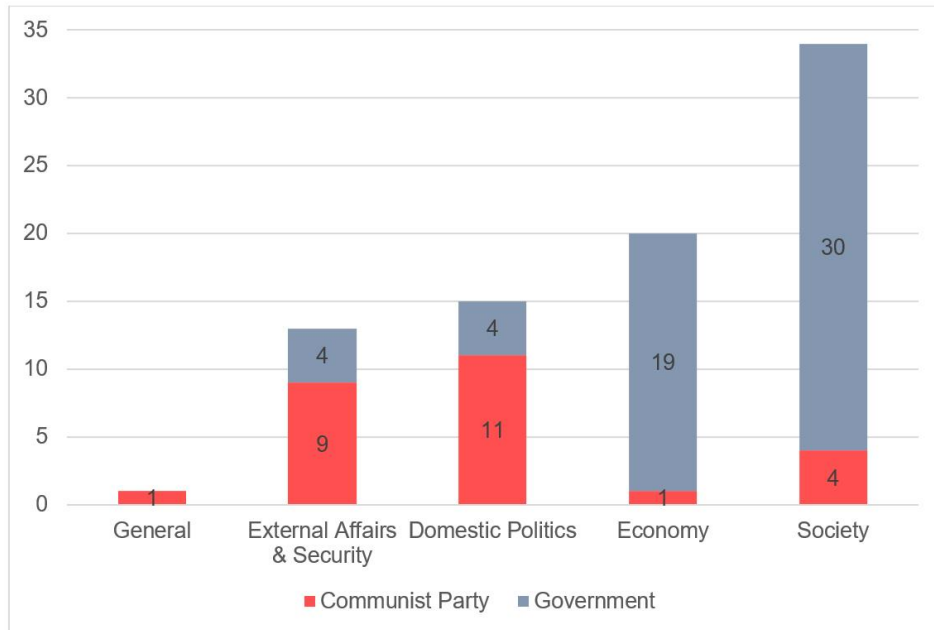


图 1 各类领导小组关注领域的分布

那么，在下一个五年间，中国的领导小组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回到最初的政治规则，即领导小组仅仅起到协调的作用，而相关议题结束后（如 2022 年冬奥会），对应的领导小组也会自动撤销。二是各类领导小组继续行使各种议题的跨部门协调咨询职能，并在一些情况下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向。三是领导小组，尤其是隶属于党中央的领导小组地位更进一步，转变为更加稳定的准决策机构。

首先，考虑到目前的政治形势，第一种可能几乎可以排除。也就是说，今后一段时间内，领导小组几乎不可能仅仅发挥跨平台的协调作用，并且具有浓厚的临时性色彩。我们发现，除了目前的 83 个小组外，以前还存在过 26 个后来被撤销的领导小组。举例来说，90 年代曾经有讨论加入世贸组织的领导小组，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个小组随即被撤销，其职能转由商务部负责。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应对禽流感的领导小组，而后该小组的职能转由农业部负责。

其次，第二种预测无疑是最贴切地反映了目前领导小组的实际地位。如果习总书记能够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实现其人事安排的总体布局，那么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其进一步加强领导小组重要性的意愿。

至于最后一种预测是否会实现，我们认为判断的标准是本次党代会闭幕后的人事和机制安排。一种可能，是看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是否会增加一名新成

员。作为政治局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的定位一直相对虚化。如果习希望进一步将自己的意愿直接地贯彻下去，那么他一种可能的选择将是增强中央书记处的构成。除了传统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典型的如人事、宣传、中央办公厅）外，习可以增加书记处的成员，使得其实权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可以预见书记处的各个书记将会负责多个领导小组，并且通过领导小组的机制，将中央的意志直接贯彻到执行环节。考虑到近年来中共对党的建设和领导的空前加强，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有相当的概率成为现实。

我们同时也在密切观察，看习近平长期以来信任的经济幕僚刘鹤是否会接替升任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成为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这样的话，中央政策研究室有望从一个智囊机构转变为一个实质上的顶层设计机构，并且负责推动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的部署和落实。总而言之，如果说我们从过去的五年中学到了什么经验，那一定是：不要基于任何陈旧的认知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对于领导小组的未来而言是这样，对于中国政治其他方面的分析来说也是如此。

本文原题为“Xi’s signature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rise of leading small groups”。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K. Johnson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Scott Kennedy 是 CSIS 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Mingda Qiu 是 CSIS 中国问题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共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新时代

Christopher K. Johnson 和 Scott Kennedy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各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已于近日闭幕。大会报告中都包含哪些亮点？我们能够从中推测出哪些未来的政策走向？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作者给出了他的分析。全文如下：

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于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过去一年中不断酝酿的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最高潮。通过这一轮人事变动，习近平总书记有条不紊地在政治局里增添属于自己的印迹，并且泰然自若地将自己的领导地位提升到比目前的“核心”更高的程度。同时，本次大会也标志着传统意义上中共领导人十年任期的中间点。不过，各界也早有传闻，猜测习总书记会在五年后打破这一常规。另外，尽管不如人事变动那么抓人眼球，但本次大会还论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重点，并且通过了最新的党章修订案。

问题 1：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大会的机制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共选举产生近 2300 名党代表参与本次党代会。这些党代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成员既包括中共的高级干部、政府的部长级官员、重要的军队将领，也包括代表所谓草根阶层的普通工人、科学家、农民、甚至是体育明星。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中，党代表分组讨论了总书记的报告，并就新的党章修订案进行了讨论。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两千多名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包括 200 名左右中央委员，和 150 名左右中央候补委员。作为在领导人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召开的党代会，本次党代会上发生的高层人事变动之剧烈，令人印象深刻。这是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带来的直接结果。在十九大结束后，新的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了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军委的人员名单。

问题 2：十九大报告中有哪些亮点？

答：本次的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习近平上台五年来提出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成果。这些成果的主线，简单来讲，是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 95 年历史分为了三个时期：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时代、改革开放的邓时代、以及当今的习时代。为了强调这一点，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习已经在理论成就上远远超出了他的两名前任，更意味着他在党内的地位不仅已经微微超过邓小平的“理论”，而且与毛泽东的“思想”能够比肩。尽管本次工作报告并没有在这一思想前冠上习近平的名字，但这很可能只是由于习本人的谦虚化处理。在参加各代表团讨论时，有多名常委都在发言中提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意味着党章修订案中几乎肯定会出现冠有习本人名字的这一提法。

此外，在本次政治报告中，除了以往既有的“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和“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大目标，还新加入了一条“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增目标被设定在2035年并不是偶然的，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个时间恰好位于二十大之后，意味着习近平有望亲自带领全党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即便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展望2035年的局势恐怕还为时过早，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外部观察人士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党新制定的长期目标极大丰富了习近平执政思想的内涵。早年间，一直有人批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过于笼统，不够严谨。然而，正如此次报告所论述的，本次新增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包含了多个具体的目标，更加科学和具体地阐述了其执政的长期计划，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以往每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出现的“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倍”和“到2021年实现经济总量翻倍”的提法本次没有出现在报告当中。这也说明，本次报告做出的政治判断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观察上的。

问题 3：从报告中可以解读出哪些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趋势？

答：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在报告中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最好的证据，就是那句我们熟知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出现在此次报告之中。尽管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被报告所引用，但报告同时也提出了做大做强国企，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习近平还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同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认为中国将能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支持。

对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本次报告既包含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也包含令人担忧的坏消息。好消息是，报告承诺对外国企业实现国民待遇，并且进一步在多个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服务业。此外，习近平在报告中也承诺进一步进行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在报告的最后，他强调中国是当前国际体

系的维护者，中国谋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进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

即便如此，报告中也包含了一些坏消息。比如，有一些领域的改革并没有被本次报告提及。比如说，他并没有提出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没有提及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并且支持人民币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总的来说，习近平在报告中希望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贸进程时更多遵循符合中国利益的步调，而非遵循中国贸易伙伴的步伐。

本文原题为“Xi Jinping opens 19th party congress proclaiming a new Era—His”。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K. Johnson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中国研究首席专家。Scott Kennedy 是 CSIS 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原文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污染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

Tom Chang, Tal Gross, Joshua Graff Zivin, Marrew Neidell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污染能够降低室内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力,减少污染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编译如下:

我们可以确定,污染会对健康产生危害。当污染加剧,会有更多的人住院(Lleras-Muney 2010)、出生率会下降(Currie et al. 2009)并且死亡率会上升(Currie 和 Neidell 2005)。

所有这些前人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污染的严重影响——高污染日的住院率、死亡率和发病率上升。这些调查结果在最脆弱人群中尤为突出——孩子、老人以及正在接受治疗的人群对污染特别敏感。例如,当臭氧水平升高时,哮喘更有可能发作;当人们暴露于更严重的污染时,医院中会出现很多免疫损害的情况。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受到污染的影响,并且污染对普通健康人群的影响又比较温和,这种情形下,污染的严重影响将难以衡量,我们不能简单地依靠医院的放电或死亡率对污染的影响进行比较。但是,像谚语中提到的那样,“冰山的绝大部分潜藏在水面以下”,污染对普通健康人群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环境经济学的新一代研究已经开始涉及到这个问题,试图捕捉污染带来的那些不太严重,但可能更为广泛的影响。

在一篇新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设定,通过这个设定可以测量污染带来的微妙影响(Chang 等, 2016)。我们决定测试污染如何影响工人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对经济和财富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也是捕捉更微妙的污染影响的有用途径。污染会引起头痛和疲劳,并且会损害认知能力,这些都会影响到工作中的表现。我们假设可以通过衡量生产力来捕捉这些健康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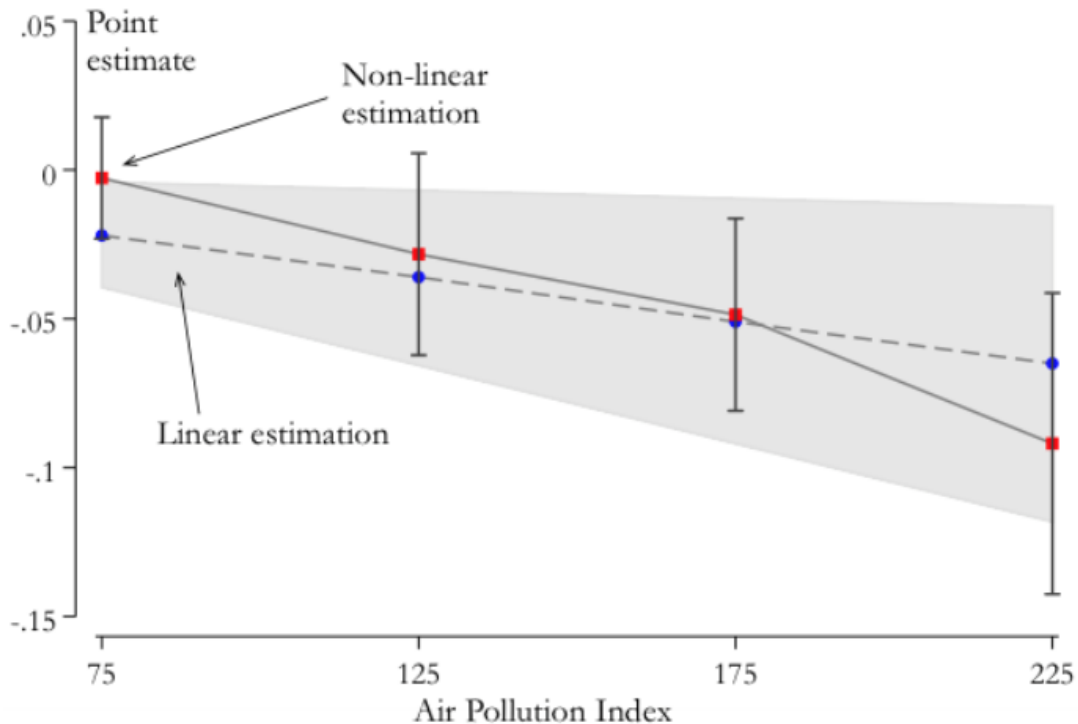
为了测试污染对生产力的影响,我们专注于两个中国呼叫中心,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南通。呼叫中心是可以反映污染影响的有效地点,原因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有一些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但讽刺的是,为了保增长,这些污染已经被容忍了。第二,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受到管理者们密切监督。在携程(我们研究的公司),每个工人的每日电话都被密切跟踪,工作人员每天处理的电话越多,奖金就越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把重点放在室内白领上,因此我们选取了携程的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先前的研究表明,污染影响了在农业和制造业中,执行对身体要求苛刻工作的工人们的生产力(Chang 等, 2014)。如果污染也能影响室内从事久坐和更多认知工作的工作者,那么这几乎可以确定,污染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颗粒物是我们关注的污染物,它可以轻易穿透建筑物。毒理学家

长期研究表明，颗粒物对人们的健康是不利的。但是据我们所知，在我们之前还没有研究表明，户外的微粒物质对室内白领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发现，随着环境中空气污染指数（API）受到颗粒污染物增加影响而不断上升，工人每天处理的来电数量下降了（见图 1）。平均而言，API 增加 10%，每天处理的通话数量减少 0.3%。考虑到我们环境中的污染范围，这一结果表明，在低污染日，工人比高污染日的生产率高出 6%。

图 1 空气污染指数增加条件下处理的通话次数



注：这一数值反映的是不同空气污染指数下工人每天处理通话次数的对数。阴影部分和支架图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重要的是，如果污染对携程工作人员的影响与对世界各地白领员工额影响相似，则污染对生产力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基于我们的调查结果保守估计，假使国家 API 水平下降 10 个单位，中国上班族产出的货币化价值每年将增加 22 亿美元。

结果也可能适用于富裕的国家。当 API 超过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标准——100 时，我们发现污染对应较低生产力的统计学相关关系显著。在 2014 年，洛杉矶污染水平超标共计 90 天，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这些天的污染水平达到监管标准，洛杉矶服务行业的产值将增加 3.74 亿美元。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探究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证实，每个城市的呼叫中心员工的生产力受到该城市污染的影响，与其他城市的污染无关。我们增加了温度控制，以确保污染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力量。同时，我们探究了污染是否能导致工人留在家里或上班迟到，结果是否定的——在重污染的日子里，我们看到工作时间相似但通话次数仍然减少。最终，所有的结果都表明呼叫中心工作人员的生产力受到了污染的伤害。

我们的论文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展示了以前没有被测量过的污染的影响。随着它的发展，美国环保局正在关注这些文献。潜在影响是，政府可以参考这些文献进行应该允许多少污染的成本效益分析。它也有助于将环境监管的政治讨论重新转变为商业社会的税收——反过来讲，减少污染可能会提高财政收入。

（编者注：该文于 2016 年 7 月首次在 VoxEU.org 上发布）

本文原题为“The effect of pollution on work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all-centre workers in China”。本文作者 Tom Chang 是 USC 助理教授，Tal Gross 是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Joshua Graff Zivin 是圣地亚哥大学教授，Matthew Neidell 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理查德·泰勒——诺贝尔奖得主

Hersh Shefrin /文 杨茜/编译

导读：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因其“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由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第一位合作者撰写，文章认为泰勒对三个研究领域有主要贡献：有限理性、对公平的看法、自我控制的缺失。编译如下：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尽管他在2016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AEA）主席，但他并不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协会前任总裁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将泰勒视为他“最喜欢的另类经济学家”。

诺贝尔奖标志着泰勒从边缘向主流的过渡，但回顾当时他的看法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另类的时候，是有启发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霍尔是主流经济学家，也是优秀的经济学家。作为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周期委员会主席，霍尔经常在美国正式进入或退出衰退周期时发声。他的学术工作教导我们如何在理性行为者的世界中建立公平有效的消费税。

相比之下，泰勒的学术工作教导我们意识到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在以下三个领域有主要贡献：有限理性、关于公平的看法及自我控制的缺失。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与Thaler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合作，最终他把前两个问题应用到了第三个领域。以此为背景，我想就这三个关键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提供一些个人观点。

在进行详细描述之前，我必须先声明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比任何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的一点：他构建简单而深刻的思想实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被训练以固定的模式思考。但泰勒不仅一个定性的思考者，他能够通过透过严谨的论证，准确拿捏到模型在哪些关键方面是不切合实际的。

自我控制的缺失

腰果热量较高，我也非常喜欢腰果。在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碗腰果，看起来很诱人，但幸运的是，这些腰果不是食品，而是陶瓷做的。他们是我在参加庆祝泰勒70岁生日时获得的纪念品。而腰果背后，是一个关于自我控制的故事。

在20世纪70年代，泰勒和他的妻子为一些朋友举行了一场晚宴。晚饭之前，他们在饥饿的客人面前放了一大碗腰果。客人们开始大量进食腰果，并很快意识到这不利于他们享用晚餐。但腰果太诱人了，他们无法停止，于是他们请求泰勒把腰果拿走。

如果你真的饿了，你会做什么，腰果很容易去除饥饿，但你也知道继续吃腰果会毁了你的晚餐？对于一位受新古典理论教育的经济学家而言，要求将腰果拿走是令人困惑的，泰勒也恰恰是其中一员。

古希腊哲学家教导我们，理性人会选择最佳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目的。新古典主义使“最优选择”变成了一个数学优化的问题。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中，人们被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优化。如果他们认为吃更多腰果不是最佳的，他们不需要任何人阻止，可以没有代价地选择做更多除了吃腰果以外的事情。

泰勒意识到，他的晚餐客人在面对诱惑时并没有理性地行事，至少在理性上不具有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他进行了一次思想实验，问自己当他不想吃腰果时什么会阻止他吃更多的腰果。这个问题让他想到了他大脑内部的一个对话，在他大脑“计划”停止吃腰果和他实际上“做”的行为之间。

同泰勒一样，我对自我控制的兴趣也源于饮食问题。我的研究源于对我妻子所做的，关于医护专业人士自己治疗饮食失调的研究的好奇——这个问题不像腰果一样引人注目！

无论如何，Thaler 和我设法找到对方，并开始合作制定一个形式化经济学模型，以期捕捉当行为者的内部计划和执行不能达成一致（Thaler and Shefrin, 1981, Shefrin and Thaler, 1988）时人们做出决定的方式。

有限的理性

一些储蓄互助社提供了一个名为圣诞俱乐部的项目。加入这样一家俱乐部的人，在一年的时间内定期将资金存入特别帐户，目的是在年底取出存入资金购买圣诞礼物。

当泰勒和我开始建立自我控制模型的时候，圣诞俱乐部项目由许多银行支持提供，并且，与直接进行储蓄相比，圣诞俱乐部项目并不提供储蓄利率。当年的储蓄账户利率比现在高得多，但不支付利息的圣诞俱乐部项目仍然更受欢迎。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加入圣诞节俱乐部并放弃利息的人是在其预算约束内进行了操作，这显然违反了新古典理性。难道这些人就这么愚蠢吗？

有些人选择将收入中的大部分消费掉，为了在年末获得更多的退税。但是平时消费的钱少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钱进行投资赚取利息。人们难道不懂得货币的时间价值吗？是因为他们愚蠢吗？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你也会在平时花很多钱，为了年终获得法律规定的极低的利息吗？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人们如果做出像上文中描述的两种行为，那就是愚蠢的。但是，在一个计划者需要对付困难行为对象的世界里，它很可能导致自

我控制的缺失。人们很有可能加入圣诞俱乐部，也可能会虚报消费以期获得大量的退税。

这两种行为都可能导致更高的储蓄率。那么，如果更高的储蓄率是目标，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是非常合理的。从理论上讲，这些行为可能不是新古典理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足够好”的。正如已故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指出的那样，“令人满意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

圣诞节俱乐部和税收过度扣留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可能会拆东墙补西墙。有严重自我控制问题的人可能在年内用信用卡大量借款，以至于年关将至时，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圣诞俱乐部的钱来支付她的信用卡借款，而非购买礼物。这反常吗？是的。这是有限理性吗？我不这么认为。

人们需要足够的冲动控制来避免反常行为。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一种方法是依靠意志力。当然，如果意志力真的那么坚定，就不需要圣诞节俱乐部或税收过剩了。

第二种方式是依靠外部强制力：如果根本没有信用卡，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状况，也就不会有不良的信用记录。

第三种方式是依靠内部强制力，即养成良好的习惯。

计划者-执行者理论认为，人们将财富分为各个独立的“心理账户”，如实得工资，流动资产，未来收入和房屋净值。心理会计习惯于遵循“啄食顺序”的原则，规定了访问不同账户的顺序。

很多人觉得花掉实得工资是最容易的。如果他们希望花掉比实得工资更多的钱，他们会先想到自己的流动资产（如支票或储蓄账户余额、债券和股票）。如果这些还不够，人们可能借钱或实施最后的手段，即通过借入或出售他们自己的财产，吸收他们的房屋净值。

心理账户可能有点武断。账户的水平没有微调。因此，遵循心理会计规则可能让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不在预算边际上。但是，在预算约束边际处进行行为并不是目标——一个体可以在边际处经营，也可以轻易地出现超支情况。

泰勒指出，人们使用各式各样的心理账户。泰勒的一个思想实验涉及到一个割草的人只会修剪自己家的部分，不会为邻居的草坪修剪。

泰勒假设，这种行为不太可能涉及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边际经营。这意味着预算线是任意的，从新古典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是对的。但是人们可能会使用预算边际作为规则参数，就像他们使用边界来分离财富类型（实得工资，流动资产等）一样。

Thaler 曾写过心理会计问题 (Thaler 1980,1985)。他认为, 现在的精神会计可能不是新古典理性的。但是考虑到人类思维的局限性, 这可能是明智的, 而且是足够好的。并且, 争取完美的理性可能会适得其反, 使最终的结果变得不够好的。

对公平的看法

在 2017 年夏末, 加勒比海, 墨西哥湾, 休斯顿和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系列飓风。在飓风伊马尔席卷佛罗里达州之后, 当地居民向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出了 8000 多宗价格欺诈的投诉。这些投诉主要与当地水、冰、食物和燃料价格升高有关。

为什么佛罗里达州居民抱怨价格欺诈? 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 遏制价格意味着需求将超出供给, 会导致部分购买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他们是否没有意识到, 遏制这些物品的价格会降低增加供应的积极性? 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 防止价格上涨到欺诈的水平, 会导致不合理配给和供应不足。

泰勒和他的同事丹尼尔·卡内曼 (Daniel Kahneman)、杰克·克内奇 (Jack Knetsch) 提出了另一种市场清算价格的思考方式 (Kahneman et al., 1986a, 1986b)。另一个选择源于泰勒的“交易效用”概念——达成的交易有多好与交易者心理上的愉悦或痛苦有关。

在公平框架中, 人们对交易的“公平”有认知概念。媒体报道显示, 佛罗里达州的一些酒店在飓风伊马尔到来之后涨价了一倍。如果酒店没有因飓风而增加相应成本的话, 付给酒店正常价格双倍的房价就会使消费者产生损失的感觉, 就会产生负的交易效用。

按照公平的原则, 收费加倍但不增加成本的酒店的行为是不公平的。但相比之下, 如果酒店收费双倍以支付更高的成本, 因此没有获得额外的利润, 就是公平的行事方式。

这是人们遵循的公平规则。公正是重要的, 就像心理会计一样重要。许多人宁可得到有限的配给, 也不愿意被掠夺, 他们宁愿选择被安排进替代性住房。消费者会因为感觉遭到不公平对待而痛苦, 但维护公平的价格并不是市场的合理价格。

结论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 (Daniel Kahneman) 因其“预期理论”获得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理解人们如何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决定的一种方式。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 卡内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斯基一起完成了这项

工作。预期理论，1979 年首次出版，是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泰勒，我不确定这个预期理论是否还会有继续发展的牵引力。

除了上面讨论的三个具体问题之外，我对泰勒的成就还有很多话要说。泰勒是第一位接触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经济学家，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这样做了。泰勒看到了自己刚刚起草的思想实验（如割草的例子）和预期理论之间的联系。

这是泰勒的创业才能，他找到了让开放的经济学家与卡尼曼，特维斯基及其心理学同事一起合作的方法。他通过努力获得了斯隆基金会、罗素圣人基金会以及最终来自 NBER 的支持。

泰勒为“经济学视角”撰写了“异常”专栏，经常激起经济学家对新古典思维缺陷的兴趣。

Thaler 和 Shlomo Benartzi 一起巧妙地运用我们的自我控制工作，通过“拯救更多的明天（SMT）”计划帮助人们节省更多。

泰勒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一起扩展了从 SMT 中获得的见解，发展出“推动”，即基于行为洞察力使用“选择架构”来诱导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这个概念对美国和英国的公共政策都有广泛的影响。

理查德·泰勒的成就当然值得被授予 2017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这些成就，我们都变得更好。

本文原题为“Richard Thaler, Nobel laureate”。本文作者 Hersh Shefrin 是圣克拉拉大学金融学教授，是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先驱之一。本文于 2017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萨拉菲主义崛起对加沙的威胁

Colin P. Clarke/文 曹园/编译

导读：萨拉菲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他们信奉没有删减或更改的伊斯兰教原初教义。该派别成立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受到基地组织思想影响，坚持建立正统宗教国家、反以色列和反西方的立场。作者认为，萨拉菲主义已成为威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一大障碍。编译如下：

曾经长期不和的巴勒斯坦派系哈马斯和法塔赫可能正在加沙地带接近和解，但萨拉菲圣战组织发动的大胆攻击可能会破坏任何和解，使巴勒斯坦人重新陷入另一场冲突。今年8月，一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靠近埃及边境的加沙地带引爆了炸弹背心，炸死一名哈马斯安全小组成员和其他几人。这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标志着另一种武装暴力出现在加沙——以色列和埃及西奈半岛之间的狭长地带，该地区人口180万，超过华盛顿的两倍。加沙激进和暴力的环境归因于越来越多的萨拉菲运动，这种新现象正威胁着取得暂时平衡的中东地区。

这名自杀式袭击者被广泛怀疑为是与伊斯兰国(或ISIS)有关联的巴勒斯坦萨拉菲派组织的成员。强硬的萨拉菲派的崛起——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信奉对《古兰经》的文学解释，主张恢复所谓的全球哈里发——是加沙的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哈马斯的意识形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强硬的伊斯兰政治的融合，它正被更多的暴力极端恐怖主义组织淹没，这些组织决心摧毁以色列，并对被其认为过于温和的巴勒斯坦组织发动战争。

强大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萨拉菲主义在加沙扎根，正值巴勒斯坦学生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学校留学回国。据记者贾里德·马斯林(Jared Maslin)介绍，今天，加沙地带的一些萨拉菲派组织仍然得到利雅得的资金支持。其中四个主要的活跃团体分别为真主的支持者、伊斯兰军队、国民军以及一神论和圣战组织。

尽管这些组织在传统上并不是巴勒斯坦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萨拉菲从2007年夏天哈马斯和法塔赫内部冲突的权力真空中获得了牵引力。2009年，萨拉菲派领导人穆萨，真主安拉的领袖，甚至在南部城市Rafah宣布成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后来他在哈马斯的一次袭击中被杀。

ISIS 的哈里发宣言有助于恢复萨拉菲意识形态。伊斯兰国 (ISIS) 本身就是一个强硬的萨拉菲派组织，它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加沙的萨拉菲势力。例如，以加沙为基地的萨拉菲集团发布的媒体声明包括了由 ISIS 宣传机构最初制作的歌曲和图像。更广泛地说，ISIS 宣布“哈里发国” (caliphate) 是该组织意图管理一个由严格伊斯兰法律统治的国家的官方声明，这有助于重振萨拉菲派的意识形态。该组织的全球吸引力在于，它能够招募数万名外国战士，并在网络上培养数万名支持者，宣传思想意识并传播信息。在过去的 6 个月里，哈里发政权被摧毁了，ISIS 也处于混乱之中。但该组织的短暂成功证明了它的支持者建立一个由严格的伊斯兰原则统治的哈里发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义务。

从侧面包抄哈马斯

以 ISIS 为例，该组织成功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在加沙活跃的萨拉菲派组织已经竭尽全力地将自己定位为被占领领土内最激进的组织。这些团体认为哈马斯成员不信任他们愿意在 2006 年参加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但是萨拉菲集团本质上反对选举，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上帝的律法是重要的，伊斯兰教是唯一可接受的管理平台。在他们试图向哈马斯声明道义上的高地时，这些组织已经把成员部署到视频商店、网吧以及他们认为“非伊斯兰教”的其他场所。

加沙的萨拉菲派也批评了哈马斯同意与以色列停火的主张，声称曾经令人恐惧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以使用自杀式炸弹而闻名，现在却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合作。一个名为“一神教旅”的组织称哈马斯为“变态”和“不正当”，并补充说“不会停止攻击哈马斯”，并且要“敲碎他们的骨头来净化加沙地带的纯净土地”，为了破坏停火，在加沙地带的 ISIS 支持者会间歇性向以色列边境发射火箭弹，以惩罚其不服从命令。作为回应，哈马斯发动了一场针对萨拉菲的运动，在没有经过审判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数十人聚集在一起并实行囚禁，紧张局势甚至升级为哈马斯和萨拉菲之间的交火。

实际上，这些萨拉菲派组织正在挑战哈马斯声称自己是巴勒斯坦各组织中最真正的伊斯兰组织的言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能力推动哈马斯走向更加强硬的立场。在这之前哈马斯已经失去了一些更为激进的成员，包括许多来自其军事派别的成员，他们主张对以色列采取更加军国主义的立场。

以色列的观点

以色列比哈马斯更担心加沙萨拉菲圣战者的崛起。这个犹太国家已经习惯了其邻国不断遭受围攻，但跨国圣战分子所带来的危险尤其严重。尽管以色列相对而言不受基地组织袭击的影响，但总部位于埃及西奈半岛的一个有组织且有强大能力的 ISIS 分支机构的出现，却又一次向特拉维夫提出了安全挑战。这些叛乱分子经常与埃及安全保障部队发生冲突，并声称对 9268 航班遭受袭击的事件负责。这架飞机是两年前由一枚 ISIS 炸弹炸毁的，机上 224 人全部遇难。同月，ISIS 发布的一段希伯来语视频警告说“没有一个犹太人会留在耶路撒冷。”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一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但以色列却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警告。

就其自身而言，以色列不承认萨拉菲和哈马斯发起的袭击之间的区别。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实际上就是加沙政府，应当对加沙地带的任何和一切袭击负责。这就意味着萨拉菲的袭击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财产开展报复。因萨拉菲的罪行去惩罚哈马斯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它很容易就会使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再起波澜。自 2014 年 8 月下旬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行动上一直保持稳定。

减少加沙的萨拉菲带来的威胁势在必行。在与以色列的三次连续战争中，加沙的年轻一代已经成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希望和信心供不应求。这些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被贴上了“哈马斯一代”的标签。但是，如果加沙的经济形势由于埃及实施的经济封锁继续恶化，那么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最终可能会被称为“萨拉菲一代”。正如哈马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超越法塔赫成为最激进、最暴力的巴勒斯坦组织一样，加沙的萨拉菲也会超越哈马斯，成为对其他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国家最大的威胁。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表明，在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中，又一个缓和的机会遭到破坏。

本文原题为“[How Salafism's rise threatens Gaza](#)”。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海牙国际反恐中心副研究员 Colin P. Clarke。本文刊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 RAND 官网。[单](#)
[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

Scott A. Snyder/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特朗普借朝核试验的余热未退，于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讲话，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朝美对话的关注。2017年9月22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朝美关系的发展进入沸点状态、特朗普与金正恩存在巨大的沟通风险以及朝美将继续对话等内容。具体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唐纳德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独立讲话。特朗普的讲话除了激烈的言辞表述以外，涉及到很多吸引朝鲜金正恩的主题。特朗普宣称：“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如果被迫捍卫自己或盟友，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摧毁朝鲜。”

没有人会在面对威胁时选择退缩，金正恩针对特朗普的侮辱性语言发表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声明，声称他“将认真考虑采取历史上最慎重、最高等级的强硬对策”。"朝鲜外交部长暗示朝鲜有可能会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核试验。

如果说这场口水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现在有了直接的互相关注，尽管处在相互谩骂中。

沸点

但是现在，美朝关系的温度似乎已经达到沸点，迫切需要扩大外交对话以防止误判增加风险，并且要在双方之间建立清晰的核威慑基本准则。

过去十年来，朝美外交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朝鲜以放弃无核化为目标，而美国却坚持实现朝鲜无核化。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已经明确将核发展作为国内合法化的来源，成为解决其国家军事弱点的方案。另外，核发展成为与朝鲜进行谈判、对话必将涉及的内容。

但是，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交流要注意两人之间存在沟通不畅和词不达意的风险，以及扩大带宽应对危机的必要性。

巨大的沟通风险

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误解反映在他的言论中：“火箭人正在为自己和他的政权执行自杀式的任务”，原因有两个。首先，金正恩试图通过消除他对外部攻

击的脆弱性而生存下去；其次，特朗普的言论构成了对朝鲜领导人的直接挑战，即没有人可以侮辱金正恩的“最高尊严”。

但是，金正恩显然无法把握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威胁的认定程度，或者其他暗示美国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言论。

尽管金正恩希望在核发展方面与美国比肩，但是一旦明确朝鲜拥有直接打击美国的核能力，那么由于朝鲜的误判带来的战争风险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这是由于对双方意图误解、对朝鲜核原则不确定性，以及对如何防止对方采取最坏举动的过度放大。

减少误判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有关对方如何看待另一方挑衅行为的交流。

继续对话

在近期内，朝美两国有可能坚持采取一些列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对朝鲜核国家定位的未来谈判产生影响。因此，朝鲜将继续进行核测试，而美国则继续执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双方都越来越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以帮助应对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风险。两国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用来塑造双方谈判的结果。不过，依然需要建立牢固的沟通渠道，以此作为减少意外战争造成风险的手段。

至少，特朗普和金正恩需要找到一种继续对话方式，他们现在开始关注在尽可能非公开与非夸大的形势下如何减少对双方的误解与核误判的风险。

本文原题为“Trump’s war of words and Kim Jong-un’s response”，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韩政策项目研究主任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使事情更好还是更糟？

Steven A. Cook/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9月30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南部的一个缓冲区，并在那里投放了大量装备，准备在伊德利卜省（Idlib）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区”。本作者认为，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合作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决定是基于其对库尔德武装的担忧。但是，土耳其的行动将面临伊德利卜主要武装派别沙姆解放阵线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稳定局势、能否达成与俄罗斯的交易将成为土耳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大考验。编译如下：

跟踪叙利亚发生的事情并不容易。在经历了六年战争，三十万到四十万人丧生（同时一半人口流离失所），令人眼花缭乱的派系，外国军队和极端主义组织之间混战后，已经很难知道谁与谁有什么样的利益或如何停止厮杀。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争夺 ISIS 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市（Raqqa）以及代尔祖尔（Deir Ezzor）的战争在不断加剧，其中代尔祖尔是伊拉克的大门和产油区；但是该国其他一些地区的战斗强度在减弱。这是因为叙利亚政府部队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伊朗革命卫队和俄罗斯轰炸机——已经占领和控制这些区域。俄罗斯人率先在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和大马士革东部的古塔地区（Ghouta）地区建立了“冲突降级区”。

上周末，当世界聚焦在朝鲜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全民投票时，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南部的一个缓冲区，并在那里投放了大量装备。这是为在伊德利卜省（Idlib）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区”而做的准备。伊德利卜是一片夹在东部的阿勒波（Aleppo）和西部的土耳其哈塔伊省（Hatay）之间 2300 平方英里的地区。

去年 5 月，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政府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Astana）达成建立冲突降级区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必须终止敌对行动，必须加快人道主义援助和修复基础设施。各方抑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冲突降级地区备忘录”所提及的“担保人”也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实现停火”；继续打击 ISIS、“努斯拉阵线和所有与基地组织或达伊什（DAESH）/ ISIL 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事业及实体”；并鼓励那些没有加入停火的武装组织也这样做。只要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政府同意，这个协议可以每六个月更新一次。希望冲突降级将产生持久性停火效果，最终将使叙利亚内战结束。

自从俄罗斯在 2015 年 9 月的介入之后，阿萨德政权已经重新掌控越来越多的区域，伊德利卜省（Idlib）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地区。该省由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沙姆解放阵线（HTS 或 Tahrir al Sham，即前努斯拉阵线）和自由沙姆人

伊斯兰运动（Ahrar al Sham）掌控。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是一个由极端分子和一些相对温和的武装分子组成的伞形组织，尽管许多极端成员已于 2017 年 7 月加入了沙姆解放阵线（HTS）。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这两个组织曾在土耳其为推翻阿萨德统治而进行的令人挫败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那之后安卡拉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叙利亚的“起义”变成军事对抗后不久，叙利亚“库德尔人民保卫军”（Syrian 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Units, YPG）的崛起，及其在战场上影响力的增加，改变了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冲突中的目标。YPG 与库尔德工人党（PKK）关系紧密，而后者是一个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团体，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库尔德人的独立或者自治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血腥斗争。土耳其政府现在感兴趣的不再是帮助叙利亚人从阿萨德政府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而是镇压库尔德民族主义。面对美国与 YPG 合作对抗 ISIS 的现实，土耳其对叙利亚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库尔德斯坦区域独立（库尔德人称为 Rojova）的担心与日俱增——该区域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分子联系密切。为了将威胁及早扼杀，土耳其选择与阿萨德政权的保护人——莫斯科和德黑兰合作。

当然冲突降级区对于伊德利卜的居民而言是积极的进展。在长期的暴力冲突之后，战斗行动的停止将带来一些回归常态的可能，尽管叙利亚的冲突常常在宣布停火后仍然持续。事实上，就在土耳其人为冲突降级区做准备的时候，叙利亚和俄罗斯空军在伊德利卜执行了一次致命的空袭，导致数十名平民丧生。尽管如此，五月份签署的备忘录显示外交斡旋在叙利亚仍然是可能的。如果冲突降级区带来了稳定的迹象，那就是进步，即使其意义会因为三位保证人均不同程度地介入叙利亚流血冲突而打折。任何停火都是对阿萨德有利的。即使如此，拯救伊德利卜的无辜生命都是一件好事。

目前关于土耳其打算如何影响伊德利卜的冲突降级区仍不明确。上周在缓冲区的行动表明土耳其在加快速度并计划兑现他们的承诺。但他们尚未说明土耳其军队计划派遣多少士兵或者顾问进入他们所负责区域。有一些说法称 300-500 人将与叙利亚国民军（Jaysh Watani）联合行动——后者是个由大约 40 个派别或民兵武装结合起来，目前更多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以平定这一由“沙姆解放阵线”（Tahrir al Sham）统治的地区。这也使得土耳其观察家们日益怀疑安卡拉能否像 2015 年 7 月向美国保证的那么可靠——当时土耳其军队正准备加入反对 ISIS 的美国同盟。也许情况没那么复杂。

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土耳其的犹豫。沙姆解放阵线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组织，而且它对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的叙利亚计划不感兴趣。如果沙姆解放阵线拒绝合作而引发全面冲突，土耳其人更可能导致伊德利卜冲突烈度的增加而非降低。那么再一次，土耳其拥有充足的理由不让这种情形发生。在与莫斯科和德黑兰的合作已经深入的情况下，安卡拉的官员需要展现他们能够履行协议。在伊德利卜，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土耳其那样程度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依赖于安卡拉在当地扮演重要角色，并进一步重建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控制。这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这样的预期，即如果它的盟友无法对付沙姆解放阵线，土耳其将被迫部署更多的本国军队进入伊德利卜。那么当土耳其军队开始陷入冲突泥潭且土耳其士兵开始阵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不能安定伊德利卜，将产生明显的军事和外交冲击，证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清洗行动削弱了北约的第二大军队，且潜在地损害了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伊德利卜换阿夫林（Afrin）”的交易。自五月备忘录的细节公布以来，土耳其观察家们一直怀疑埃尔多安已经同意了普京的提议：用伊德利卜交换俄罗斯同意其推进到靠近到阿夫林的区域——一个在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控制下的小镇，因靠近土耳其边境而让人不安。俄罗斯官员不太可能在莫斯科没有拿到伊德利卜要价之前，就把土耳其人想要的东西给他；毕竟他们不是一贯放心土耳其承诺的美国官员。

如果土耳其未能建好伊德利卜的冲突降级区，对俄罗斯将是一次挫败，但是他们（以及伊朗人）应该很欣慰让一个西方盟友土耳其陷入了叙利亚泥潭。一个削弱的土耳其将损害大西洋联盟，符合俄罗斯的目标。考虑到冲突的发展、美国的选择以及土耳其人的决定，安卡拉除了靠近莫斯科以寻求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别无选择。同时应付沙姆解放阵线和俄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原题为“Turkey’s incursion into Syria: making things better or worse?”。本文作者为国际研究中心埃尼恩里科·马特艾高级研究员 Steven A. Cook。本文刊于 2017 年 10 月 2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